



吉田茂
的
执政生涯

〔日〕猪木正道著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

〔日本〕猪木正道 著

江培柱 郑国仕 译

赵安博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6年·北京

评传吉田茂

猪木正道 著

责任编辑：张造勋

责任校对：王志平

封面设计：杨莹莹

吉田茂的执政生涯

〔日本〕猪木正道 著

江培柱 郑国仕 译

赵安博 校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4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双桥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1.5印张 字数288(千)

1986年3月第一版 1986年3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统一书号：11220·11 定价：2.20元

译者的话

吉田茂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曾多次担任执政党和政府首脑，被认为是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他的思想及其制定和推行的政策，至今仍对日本发生着重要影响。因之，在日本还时常出现“吉田茂热”。

日本国际问题专家猪木正道(曾任京都大学法学院教授和防卫大学校长)为吉田茂撰写了全面的传记。本书原译自《正论》月刊连载部分(1980年1月-1981年10月)，相当于单行本的下卷，即吉田茂执政生涯部分，是这部传记中的核心。全书出版后，我们又对照进行了校译。

本书作者选取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到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这一段风云变幻的重要历史时期，通过吉田茂争取实现和平和担任外相、首相职务的主要活动，评价了他对结束战争、重建日本的贡献，特别是在维护独立、振兴科学、恢复经济、解决国计民生和重返国际社会等方面的作为。作者写出了吉田茂敏锐的“战略”眼光，敢冒风险的决心和魄力，果断的政策措施，老练圆滑的斗争策略，以及不无怪癖的性格作风，文笔流畅。对了解吉田茂其人和日本从战争废墟上走过来的历程，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历史和近代史都有参考作用。

但是，从书中也可看出，吉田茂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谋士，他的反共反华的意识和立场是很坚决、顽固的。他的许多言行，包括结束侵略战争，对中国问题的所谓“远见”和设想，无疑皆出自维护垄断资本和国际反共势力利益的需要。如他在拟给

NY 62/08

杜勒斯的信中说什么要“把中国拉出来，使其成为自由国家阵营的伙伴”；并向杜勒斯毛遂自荐地说，“日本能够有所作为的一项就是渗透”，“日本发挥突破竹幕的作用是最适当不过了。”而作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有的地方却加以肯定、渲染和美化。在所引用的历史材料中也不乏对我称谓不当、乃至诋毁之词，请广大读者注意分析和鉴别，我们对个别地方作了必要的删节。

本书由江培柱、郑国仕同志负责翻译并作了注释，赵安博同志校阅。原书中引用的吉田茂本人著述的一些段落，翻译时参照了《十年回忆》的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出版）并作了部分改动。谨此说明。

译 者

1986年1月

目 录

第一章	争取和平	1
第二章	外务大臣	51
第三章	组织内阁	99
第四章	第一届吉田内阁	148
第五章	下野时期	243
第六章	第二、第三届吉田内阁	276

第一章 争取和平

有一种说法认为，日美开战是日本中了罗斯福总统设下的圈套。自从1948年(昭和23年)美国伟大的史学家查尔士·彼阿德严厉批评罗斯福准备开战的外交以来，有人简直如获珍宝，持续不断地根据彼阿德的学说，为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开脱责任。

当然，开战前夕美国外交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对于近卫首相试图通过和罗斯福总统的首脑会谈来回避日美开战的努力失败一事，约瑟夫·格鲁大使就提出过批评。据约翰·埃默森公使的回忆录《急风暴雨中的外交官》(朝日新闻社1979年版)所载，格鲁大使说，“直到最后，大使馆的劝告始终是正确的。罗斯福总统应当会见近卫公爵，不论成功的可能性如何小，为了拯救和平，不应抛弃这最后的机会，这是我们始终不渝的信念。”

但是，日本把周围国家几乎都作为敌人、进行名副其实的全面战争，那些军国主义领导人究竟在想些什么？保障国家安全的大前提是尽量减少敌人，增加朋友，这是人们的常识。到处树敌、减少朋友而进行战争，无论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也是不能取胜的。

即使罗斯福设下了圈套，而陷入圈套的人的政治责任也是严重的。1904年(明治37年)2月日俄战争开始时，日本就有日英同盟这样强有力的国际支援。再考虑到当时美国和大英帝国之间有

“不成文的同盟”关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几乎是和全世界国家站在一起而进行战争的。

但是，相反，帝俄一方是孤立的。虽然有俄法同盟，在日俄开战后两个月，由于英法协商的结果，有关对日战争问题，这一同盟基本上失去了价值。

日本进行日俄战争的情况是：只把俄国一国作为敌人，而以英国为首的朋友却不断增多。从指导战争的观点来看，日俄战争当时的日本，处境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1904年以后仅仅过了37年，同样的日本，却在以许多国家为敌的绝望形势下，同英美等国开战，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朋友只是希特勒的德国和莫索里尼的意大利。德意两国的支援是无济于事的，无异于从“霞关大楼”（日本外务省所在地——译者）的屋顶滴眼药水，毫无疗效。相反，同希特勒德国结成军事同盟，正是把日本推向绝望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埃默森公使的回忆录载有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往事：

1941年（昭和16年）10月14日，从旧金山登陆、11月中旬到国务院任职的埃默森会见了赫尔国务卿的远东问题顾问霍贝克。霍贝克问：“你们大使馆的人对于同日本的战争有什么看法？”埃默森回答说：“我们认为日本虽然急于统治东亚，但是并不企图以战争方式实现，如果他们感到做不到这一点，将会自暴自弃地诉诸战争。”霍贝克对此反应很是严厉：“你说说看，历史上曾有哪一个国家自暴自弃地发动战争？”

的确，在历史上也许找不到任何一个自暴自弃地进行战争的国家。而日本恰好开了这一先例。正如埃默森公使所承认的，他对霍贝克的见解是重复了格鲁大使屡次强调的警告。格鲁大使1941年11月3日向赫尔国务卿发了一份长电，最后的结论是：“如果日本认为同美国的武装冲突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以突然的方式采取剧烈的行动。”格鲁大使在第二天的日记中，使用

了“整个国家剖腹”的用语。他不断强调和极力主张,这不仅是将会发生的,而且是非常现实、十分可能的。格鲁大使正确地指出:“日本的伦理、理性是无法用西方尺度衡量的。”格鲁大使的警告不幸而言中。日本终于陷进了几乎是绝无仅有的自我毁灭的战争。

无论是日本政府或统帅部,都是在无视德苏战争进展的情况下,断然决定同英、美开战的。这一点我们不可忽略。1941年10月初,德军发动的第一次莫斯科的攻势取得了相当成功。10月12日卡卢加陷落。两天以后,加里宁格勒也被攻下。10月16日起连续3天莫斯科发生恐慌,据说大约有100万市民逃了出来。但是,诺门坎战役的胜利者朱可夫元帅被任命为莫斯科城防司令。由苏中边境调来的增援部队,迅速地加强了苏联的守卫力量。在11月17日开始的第二次攻势里,德军逼近离莫斯科中心34公里的地方,由于零下30度严寒天气的帮忙,苏军开始转入反击。

进攻莫斯科的惨败使希特勒德国第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而且不仅是一个局部地区战局的失败,它关系到希特勒德国的命运。如果对苏的闪电战不能成功,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第三帝国的彻底失败。

希特勒德国的失败是注定不可避免的,难道日本的战争领导人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吗?德军在莫斯科城下的总崩溃,他们显然是知道的。但他们仍然下决心同英美两国开战,除了用“剖腹自杀”来形容之外,还能说些什么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塞巴斯蒂安·哈弗那的最畅销书《论希特勒其人》中,把德国的参战称之为不可理解的最严重的错误决断。哈弗那认为,希特勒是在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的,但这一宣战没有给德国带来任何好处,而只能使战败成为定局。

由于日德意三国签订的是防御同盟,所以不能因日本陷入对美战争,德国就负有义务自动参战。罗斯福总统虽然很想参战,但是如果德国对美国不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如果希特勒毫无动静,

美国就没有理由对德宣战。可以肯定，希特勒对美宣战正是罗斯福求之不得的。

哈弗那的主张很有说服力。他认为，如同日本对德苏战争袖手旁观一样，德国也应在日美战争中持旁观态度。正象哈弗那所说的，对美宣战对于德国来说是致命伤。

为了解开希特勒令人毛骨悚然的决断之谜，哈弗那引用了希特勒在参战两周前一次令人害怕的谈话。他说，德意志民族为了求得生存，如果不作流血的准备，必然被其他更强大的国家所灭亡。这是他当时对丹麦和克罗地亚的外相说的。

希特勒在战败的那一年又重复了同样的话，命令军需部长施培安，破坏德意志民族为了生存所必要的一切生产、运输和通讯设备。

哈弗那的解释是否正确自当别论，也许可以说，日本同这样一个变态人物统治的国家结盟一起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恰好证明日本本身也是不正常的。

二

除了吉田茂等极少数人以外，战争开始时的日本，恐怕可以说已经接近疯狂的程度。特别是奇袭珍珠港的辉煌战果足以迷住了国民的心窍。

但不要忘记，就在当时也有人能以冷静的眼光，看清战后世界和日本的形势。和吉田茂同为高知县出身、比吉田小一岁的岩崎小弥太就是其中之一。开战后第三天，他以三菱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身分把嫡系干部召到总公司进行训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所讲到的“对英美旧友的态度”这一部分。

他说：“原来有不少和我们三菱公司在事业上相互协作的英美人士，直到今天他们仍为我等的朋友。在同一事业中始终相互团结共事，具有同一利害关系，目前不幸分属于干戈相见的两个国

籍。国家对于他们的企业和资产采取合法措施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因此而毁掉旧友谊。所以，只要国法允许，维护他们人身财产的安全和权益，是我们日本人基于道义的情理，也是应尽的义务。他日，和平恢复时，他们仍将和过去一样是我们的忠实伙伴，而且将来也应当是忠实的盟友，以便相互团结，重新致力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

在三菱公司协议会上的这一训示，立即付印、分发给三菱公司每个成员。当时我在三菱信托的福冈分店工作。读到这一训示，十分感动，这是难以忘怀的。因为我感到，在仇视英美两国国民的气氛中有勇气讲这种话，实在是我国的莫大骄傲。

当时，美国驻日大使格鲁夫妇被软禁在东京大使馆里。吉田茂经常去看望他们并送些东西。吉田也和岩崎小弥太男爵一样确信，战后日本会同英美两国建立友好关系。岩崎小弥太和吉田茂不同的是，前者认为在生产和经济领域为战争效劳是三菱最高领导人的义务，而以外交为专职的吉田则与此相反，认为应当采取措施尽早结束战争。

据《木户日记》记载，1942年2月21日下午2时，吉田茂与木户内大臣进行了面谈。谈了些什么，无从知晓。但是从2月15日新加坡陷落一事推测，吉田茂是否可能向木户建议，不要错过早日媾和的时机。在《十年回忆》的第一卷中吉田茂有如下回顾：“开战的第二年，1942年（昭和17年）2月，纪元节^①过后，即将攻占新加坡之时，听说木户内府拜见了天皇陛下，奏称：‘战局虽对我有利，但前途多难’。记得木户上奏的内容要点是，敌方丝毫未丧失战斗意志；战火不易熄灭；结局必然是战斗到底。因此，应尽早抓住机会，力求实现和平等等。

“我也认为如果要进行和平工作，攻占新加坡之后是一个不可

^① 旧纪元节是2月11日，现改为建国纪念日。——译者

放过的好机会。新加坡是盟军、特别是英军在远东的生命线，控制这一要冲，将使今后情况向有利方向进展，成为重大的转机。因此利用这一机会推进和平谈判，将使战争早日结束。至于具体如何做，我也设想过。”

认为攻克新加坡是寻求和平的良机的人不仅是吉田茂一个人，这是许多日本人当时的幻想。比如一个小个子突然向一个巨汉头上猛击一拳，然后伸出手来说：“咱们和好吧！”，难道巨汉能心甘情愿地接受吗？肯定要拒绝说：“别胡扯！”而进行反击。

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况稍加研究以后认为，当时争取实现和平几乎没有可能。世界大战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进行斡旋、调停，除非有一方精疲力竭、举手投降，否则是不会在中途实现和平的。外交专家吉田茂考虑到“新加坡和平”的可能性是非常奇特的。可以理解为这是吉田茂乐观主义精神和坚韧不拔性格的体现，直到最后也不抛弃希望、不断探索和平途径。

责任感很强的吉田茂绝不会半途而废。即使不能马上实现，他也一定认为必须随时掌握和平的线索。

在这点上，天皇对东条首相指出要早日实现和平是很值得重视的。2月12日《木户日记》记载，东条前首相在谒见天皇时上奏“大本营联席会议将对今后内外政策进行研究”时，天皇指示说：

“关于结束战争，想来你们也能充分考虑到不坐失良机。为了人类和平，一味拖延战争，扩大危害是不好的。而且战争拖长，军队素质必然下降。当然这一问题与对方有关。今后要看英美态度如何，也要看德苏之间战况推移，半途而废毫无结果也是不好的，但是要充分考虑上述情况，制定万无一失之对策。”

在这种情况下，吉田茂从两方面进行了努力。一方面，对辅佐天皇的木户内大臣经常讲授一些外交知识；另一方面，为准备将来的和平而收罗国内的政治力量。吉田茂给他的岳父牧野伸显的两封信，表明了他的动向。一封日期不详，从前后文脉来看估计

是1942年(昭和17年)3月写的,内容如下:

“拜启。日前曾进言要币原男爵常与近卫、木户两人接触,努力使他们增长一些外交知识和素养。高松官殿下那里也应时常会晤,以使高松官听取外交方面的意见。后来未见进展。此事,我请松平康昌侯爵斡旋公侯和男爵的会晤,谅你已有所闻。昨天和原田熊雄在来栖处见面,也提到上述情况。我以为,解决当今时局问题只有依赖外交。而当局埋头于军事内政,缺乏对外交的关注。如此下去,总有一天战争会出现灾难性结局。虽无把握,但我以为两公向内府灌输外交知识实为当务之急。高松官殿下同样特别需要注意多了解外交事务。他们也甚表同意。最近将有机会见到高松官,视情况还要进言。”

“原田君等人今如前来,有便时请将上述内容转告。已有风闻德国方面强烈要求日本对苏作战,内府在此时的努力尤为重要。匆匆成书,望希见谅。顿首。”

另一封信是1942年(昭和17年)4月3日写给牧野伯爵的。这封信告诉我们,就在日本陆海军连战连胜的时刻,吉田茂仍积极安排宇垣大将和平沼男爵的会见。

“拜启。当前时局愈加险恶,对苏关系亦令人担心。如果再次突然袭击,造成既成事实,把我政府牵连进去,那真是有关国家兴亡之大事。”

“关于对币原男爵进行外交教育一事(对近卫和内府亦然)也是在最近出现令人担心趋势下提出来的。前不久,我已敦促宇垣大将下决心敢于赴难,不去计较社会上种种传闻。亲自动去拜访平沼交换意见。对平沼,我也劝他在宇垣来访时,能以谦虚坦荡的胸怀予以接待和交谈时事。有幸,双方接受了我的规劝。29日,宇垣大将去平沼官邸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会谈。谈话内容尚未得知,但是据说宇垣认为谈得相当融洽,他对谈话时的气氛相当满意。以上消息我马上转达给了池田、冈田大将,他们两个人,特别是池

田很高兴。我近日还将拜访池田，面告上述喜讯和会谈情况，拜托他在平沼、近卫公、木户等人中进行斡旋。以上，特先报告。顿首。”

关于宇垣、平沼会谈的内容，《宇垣日记》3月30日和31日两天记载了要点，30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29日与平沼氏会谈，谈话内容要点为：一、破坏有余，而建设未必有方。尤其是内部思想上令人寒心的情况屡屡发生，实堪忧虑。二、政府对内外形势是否有正确认识与适当政策？如果有正确认识 and 适当政策，应当始终尽力帮助与支持。但看来并无正确认识，亦无适当政策。我等之忧虑和决心也是由此产生的。三、军人对政治的干预，必须制止，国家之祸根在此。官僚之横行霸道是因为有人追随脱离常轨之军人。如能追根溯源，彻底追查，从根本上下手，则并不难制止。敢于从事这一切的军队首领是谁呢？”

再看3月31日的“追记29日会谈”：“陛下之心是始终热望和平的。但是，辅佐陛下的臣僚们有无诚心诚意使之实现的热情和政策，是值得怀疑的。现在，日本处于微妙的境地，敌方英、美希望日苏开战，而友方德、意也要求日苏交战。当支那问题尚未了结，如果再开日苏战祸，日本必将面临累卵之危。只要中国问题得到处理，对付苏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对此，平沼表示完全同意，应当绝对避免在解决中国问题之前与苏发生事端。日本要采取主动，立即恢复同中国的邦交，以此为主要活动，进而争取恢复世界和平。”团结以宇垣一成为中心的政治力量，谋求结束战争的动向。正如后面所说的，是从1942年(昭和17年)12月开始的。但是宇垣、平沼进行会谈是它的准备。

三

在1942年6月5日中途岛海战中，日本遭受重创，损失4艘主

力航空母舰。众所周知，这次失败，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机。

吉田茂提议派近卫公爵去瑞士。他把自己的想法报告近卫，并向内大臣木户进言。《十年回忆》第一卷里吉田茂这样说道：

“前些时候我考虑过似乎可以派近卫公爵到瑞士去进行和平工作，当辗转听到木户侯爵的意向后，更增强了信心，认为我的想法有实现的可能。不知不觉间到了6月上旬，当我听到中途岛作战失利的消息时，便认为如失去和平工作的良机将不堪设想，于是立即向近卫公爵说明了我的想法。

“公爵似乎很惊讶，但我建议说：‘和皇室最亲密的公爵如果到瑞士去，即使是一般的逗留，也会引起欧洲各国的注视。倘若英国战局不利，一定会有人对公爵进行工作；倘若德国陷于苦战，也会有人来接近公爵。现在如由空中或海上去，是非常危险的，不过经由朝鲜、中国东北利用西伯利亚铁路时，即使多少有些困难，瑞士还是能去的。’公爵问：‘有希望吗？’我答道：‘有没有成功的希望，只有试探才能知道。不过我想至少在表示日本对和平的诚意这一点上会有收获。’公爵似乎也多少感到一些兴趣，并嘱咐我和木户内大臣也商议一下。

“于是我又向内大臣提出这个建议，而内大臣却不肯轻易表示赞成与否。因为我风闻东条首相早已注意近卫公爵的言行，并认为有加以取缔的必要，所以我觉察到内大臣那时也有些踌躇。结果，我的建议在内大臣那里压了下来，后来杳无音信。关于这个和平交涉，我并非成竹在胸，不过也不无遗憾，因为如果实现，情况当有所不同”。

6月11日《木户日记》记载着：“下午3时半，吉田茂来访，就近卫赴欧一事谈及他向近卫所提建议，并征询我的意见。我回答说：‘为了世界和平，对尽早结束战争这一基本出发点自然没有任何异议，关于是否派近卫出马，尚需慎重考虑。’让我们看看另页写的吉田所提的意见：

“为完成圣战和国家百年大计之事业，愿献上国见。今天正是近卫为皇室和国家作贡献之机。你应率大使或公使以及三、四名外交官，以视察为名亲赴欧洲。途中，各国元首和政治家如要求同你会谈，可以会见。经过苏联和轴心国到瑞士之类的中立国。对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可找交通便利的地方落脚。暂以超脱之态度观察形势。其间，随行人员应在暗中活动，促使各国政治家与你接触。战争如越来越对德国有利，美英将通过你寻求摆脱困境的活路。如果战局不利，德国也会采取同样态度。凭借近卫过去的阅历，美国、德国都会以你为友。我国外交如能善于运用你这样的地位，就可以使我国在和局中处于主动地位。

“你在欧洲数旬，如观察前途无望，可以若无其事地踏上归途。如果还有一些希望，可从我国文武官员、学者、企业家中选拔一些人才(最好在欧美有朋友的)开始准备和平条约草案，供帝国政府参考。同时，让这些人担当重任，促使各国同我交往，维护我国利益。一旦世界媾和时机成熟，你可受帝国政府委托，作为全权首席代表，率领上述适当人才出席媾和会议，随员可参与具体媾和事务，作为全权媾和的幕僚。”

吉田茂自己也准备随近卫公爵前往瑞士。他的心情是，只要能拯救祖国日本，什么事都愿意干。提出与近卫一起去瑞士时，还可以从陆路去，不致有生命危险。但是过了两年10个月，即战争结束前4个月，吉田茂为进入英国领土，专门拜访军令部次长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希望他协助出动飞机或潜艇保护。

幸好有1966年6月14日前舰队司令官小泽对竹内诚、宫崎勇的谈话记录，我想在这里引用一下：

“我在昭和19年(1944年)秋从南方回到东京，秋月老人曾三四次把我叫到豪德寺的住宅，他本人已年迈体衰，卧床不起，但让我坐在枕边，同我谈了很多事。因为他在明治以后当过外交官，对日英外交史特别熟悉，谆谆开导我说：‘英国过去就对日本

抱有亲切感，应当以此为基础进行和平工作。战争基本上不是打错了么？要让小矶下台了，开展一场运动赶他下去，然后让米内当首相’。因为我知道小矶内阁成立的经过，就说：‘那不大可能。’他问：‘那么谁合适呢？’我回答：‘老前辈铃木贯太郎最合适。’铃木当时是枢密院议长，可是老人说：‘铃木怎么样我不了解’，这说明他已经有些糊涂了，哈哈……

“秋月老人还说：‘好象你们对我说的不大理解，把币原和吉田叫来听听我的意见’，我婉拒说：‘不要见了，因为我在军令部而不在海军省。币原是老人在任奥地利公使时的年轻秘书，吉田是牧野的女婿，秋月老人的夫人是牧野夫人的姐姐。所以好象经常叫他们来。’

“记得是1945年(昭和20年)4月，突然捷五(秋月老人的养子)打电话到日比谷的军令部宿舍说：‘吉田急于见你！’吉田正在里屋和我父亲谈话，就让我给你打电话，要谈什么事不清楚。我就请他转达‘那么明天下午到这边宿舍来吧！’

“第二天吉田乘车来了。在二层军令部总长房间见了面。吉田说是和秋月老人交谈后有些事情请求帮忙。首先是希望提供飞机在印度或英属领地降落，把那里作为基地，开始同英国谈判。

“但当时飞机数量很少，处境十分困难，就毫不隐瞒地说：‘现状如此，一点通融余地都没有。’吉田一听说道：‘那么出动潜艇，把我们当作货物装上，拉到英国势力圈里去！’于是又谈到了潜艇的现状：‘我们的潜艇不仅无法攻击敌人，连向南洋群岛输送食品都忙不过来。’本来不应说的情况也直说了，郑重地婉拒了他的要求。吉田说：‘那就不好办了，怎样向秋月老人说明呢？’我说：‘你就向老人如实报告，小泽会向他说明的’。然后把吉田送到大门口。这时我从大门往外一看，在树荫下站着两三个怪人，我怀疑可能是来监视的。

“那以后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有消息说吉田被宪兵队逮捕了，